

领导参考

Ling dao can kao

二〇二一年第一期

总第28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重点推介

02 十四五规划生态环境蓝图

探索改革

07 从十四五看 2035：目标难度与改革对策

09 国内首个个人破产综合应用系统深圳正式上线

经济广角

11 穿越基数幻觉看中国经济

12 中国距离制造强国还差多远

科教文卫

14 武汉市将全力以赴创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15 动漫文化疫境线上拓生机

三农问题

17 激发“三农”潜力要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19 以系统动态平衡理论推动中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社会观察

21 “好声音”催生“耳朵经济”

23 中国延迟退休不搞“齐步走” 体现灵活和包容特征

综合治理

24 创新国际合作 探索碳治理密钥

26 安徽巢湖：东撤洪沟治理项目即将竣工

27 “房住不炒”实招落地 多地严查“经营贷”违规入楼市

环球视野

29 美国顶级经济智囊怎么看美国经济的发展？

31 “十四五”规划促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

32 中美经贸领域的三大潜在风险

时事观察

35 专家谈新兴市场加息狂潮

37 聚焦2021年全国两会

十四五规划生态环境蓝图

英国“中外对话”2021年3月25日

在今年重要的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大部分时间都笼罩在重霾里。生态环境部长黄润秋没有出现在今年的部长通道上。3月11日，在全国人大通过“十四五”规划纲要的这天，他去了唐山突击检查钢铁企业排放，发现多家企业无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依然高负荷生产，且存在生产记录造假等问题。相关线索被移交公安部门。在去年“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刚履新的黄润秋被两次问到空气质量问题。他告诉记者，“十三五”规划中被作为约束性指标的PM2.5浓度指标已经超额完成，“老百姓普遍感受到周围的蓝天白云多了”。在被问及即将到来的“十四五”的生态环境部署时，他说，由于当前国家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环境污染形势没有根本改变，“十四五”依然要打好“升级版”的污染防治攻坚战。

今年1月黄润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把这场升级版攻坚战的总思路总结为“提气”（提升空气质量）、“降碳”（碳达峰）、“强生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增水”（改善水生态）、“固土”（防治土壤污染）、“防风险”（防范核与危废风险）”。同是1月，生环部开始把“降碳”比作“牛鼻子”，表示将用它来牵引其他各项工作，这也可以成为理解“十四五”时期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框架之一。

作为中国宣布碳中和目标后出台的第一份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的气候能源类目标今年广受关注，而生态保护与气候行动相协同的思路也贯穿在这份环境蓝图的其它部分。

从治污协同降碳，到降碳协同治污

2015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首次提出将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之后公布的“十三五”规划首次纳入了PM2.5治理的量化目标。随后的五年，对空气污染的治理与气候应对行动相协同，并为后者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使得两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果。“十三五”期间，曾经雾霾严重的京津冀地区PM2.5浓度降幅超过36%。在强力的大气污染治理带动下，中国的能源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从2015年的63.7%下降到2020年的56.8%。

“十四五”期间，两者的“协同增效”将继续被强调。只不过，在中国业已宣布碳中和目标的时代，“降碳”现在成了“牛鼻子”，不仅反过来牵引空气、水、土污染的治理，而且带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等工作。这也反映在生态环境部自身的改变中。2018

年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除了继承原先环境保护部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领域的职能，也接管了归属国家发改委的应对气候变化职能，从而打通了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管控。但是，对这项新的职能，它至今仍然存在认识、能力与工具的短板。今年1月，生态环境部发文提出要补齐这些短板，从而在“十四五”期间促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与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协同增效。这包括推动在现有生态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修订过程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内容，统筹融合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标准体系，在环境影响评价中纳入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在中央环保督察中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内容。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首次纳入了臭氧。过去几年，煤炭使用的显著减少使中国大气二氧化硫浓度大幅下降，但臭氧浓度却缓慢上升，偶有超标。这是因为来自工业和交通的臭氧前体物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VOC）的排放依然居高不下。它们也是PM2.5的前体，因此控制住它们就能同时减少臭氧和PM2.5，并协同控制来自工业和交通的温室气体排放。

此外，生态环境部还提出加强禽畜养殖、污水、垃圾管理，从而协同控制来自这些部门的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而对这些二氧化碳之外的“其他温室气体”的治理也被写入了“十四五”规划纲要。

对于空气污染治理，“十四五”规划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但这并不容易实现。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要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华北地区污染物排放量要比现在减少70%-80%，即便乐观估计，在京津冀地区基本实现这一目标恐怕要到2030到2035年，而非“十四五”结束时的2025年。生态环境部官员也坦诚，实现这个目标“任重道远”，“对我们的压力比较大”。

让生态保护“落地”，助力碳中和

与治污一样，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强生态”和“增水”——被视为另一个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增效的领域。生环部此前提出要“重视运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就是说，用森林、河流、湖泊、草原乃至农田等生态系统的碳汇和生态服务功能来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而“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提升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这块工作被放在规划纲要中生态环境各章节之首，涉及三块内容：“完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完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是指建设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北方防沙带等生态屏障，加强河湖湿地的保护治理，保护天然林，绿化国土，治理水土流失、荒漠化和石漠化，

以及实施还草、还湿、还海等；“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则指开始正式成立一批国家公园，同时划定和归并出一批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从而形成一个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三级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两项落实在地图上的工作，都体现了中国以“国土空间规划”及其“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政策创新。一个中外研究团队认为，这是中国领先世界的制度探索，为同时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治理荒漠化等目标提供了一个融合工具，能有效带来协同效应并避免不同目标之间的冲突，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

这套制度始于2010年，它首先根据各地条件在全国版图上划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再按功能在其中划出城市化地区、农业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类“主体功能区”。在生态功能区内继续用生态保护红线划出最需要保护的部分。之所以叫“红线”，表示其线内将被严加守护，不可侵犯，划定过程既可能避让农业、工业和居住等非生态保护功能，也可能将它们迁出。最终，生态规划被与其他各类规划合并为一张总图，使它们不再相互冲突。据估计，在完成划定后，中国所有生态红线区域将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5%，以及30%以上的海域。生态红线区域广大，能够覆盖完整的生态系统，既保护其中的生物多样性，又能通过其中动植物和土壤固碳来产生气候效益。而且，由于对生态系统实施严格保护，它还能避免生物多样性目标和环境、气候目标之间的冲突，比如为了增加森林覆盖率而破坏草地和湿地，或是为了建造碳汇林而破坏天然林。

平衡人类发展和生态保护

于是，生态补偿就是这些顶层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因为生态红线的划定、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建立，都势必涉及对大量人口和产业的搬迁，以及对开发的限制，应当提供合理的经济补偿。为了筹集所需的巨额资金，纲要提出不仅要加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还要完善有社会资本参与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同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市场为生态保护和修复的成果定价、买单。但人究竟是否应在保护地中拥有一席之地，将是一个被持续讨论的话题。纲要提出“严格管控自然保护地范围内非生态活动，稳妥推进核心区内居民、耕地、矿权有序退出。”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项目官员彭奎博士告诉中外对话，根据他对三江源、祁连山等国家公园试点项目的实地研究，其核心区原本都是牧民的草场，对其中社区的搬迁将意味着承重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但是没有人类适度干扰，没有来自牲畜的肥料，没有管理，人的退出对草原可能恰恰是有害的。生态友好型的产业是可以在核心区内存在的”，他说。彭奎指出，国家公园核心区如果变成“无人区”，会让它的景观和教育价值无法实现。

致力于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的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闵庆文说，农业生产和自然保护是可以相一致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里应该重视传统农耕文化、生态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生态价值，从而实现生态的保护，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说。闵庆文认为，国家公园应该具有中国特色，而人地压力大依然是中国一项基本国情。

彭奎表示，由于国家公园的建立涉及面积广袤的不同法律属性的土地，并涉及移民搬迁和产业退出，因此涉及土地法、民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导致其立法工作极为复杂，进程比预想的缓慢。《国家公园法》原计划是去年出台，但至今仍在内部征求意见过程中。他透露，由于国家公园试点过程中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国家公园应该“依法设立”，而非成立后再完善立法，因此第一批国家公园的正式成立也还须稍加时日。

不仅是国家公园，优化中的国土空间规划也面临着“生态移民”的问题。纲要提出“支持生态功能区人口逐步有序向城市化地区转移并定居落户。”闵庆文认为国土空间规划概念好提，但操作难，需要各部门的协调，也需要持续的研究。

生态文明“走出去”？

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红线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生态文明”的重要支柱。前述中外研究团队建议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生态红线理念，向其提供知识和能力，从而在这些国家利用中国投资开展基建项目，或者生产销售给中国等国际市场的农林牧矿产品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气候足迹。经常在东南亚国家开展生态保护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彭奎表示希望今年在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能创造这种大势，推动政府建立机制支持科研机构和民间组织走出去，传递中国在生物多样性研究和生态红线划定和执行上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使之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走向世界过程中在商业行为之外的“另一条腿”、一种重要的“民间外交”。

这也正契合规划纲要所描绘的那个“一带一路”——它秉持“绿色、开放、廉洁理念”，增进在应对气候变化、海洋、野生动物保护、荒漠化防治等领域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在绿色发展领域开展国际人文合作，建设“绿色丝绸之路”。

其中关于海洋的一章，则从另一个方面折射了中国生态理念的向外延伸。

“人海和谐、合作共赢，推进海洋生态保护”这些表述出现在海洋专章的前言里，而“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这个位置的措辞还侧重于发展海洋经济和开发海洋资源。一个引人瞩目的改变是今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发展可持续远洋渔业”，而五年前使用的表述是“发展远洋渔业”。

中国在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发展远洋捕捞”，此后中国远洋捕捞能力快速增长，远洋渔船数量在世界遥遥领先，作业海域已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船队非法、未报告和管制捕捞活动（IUU）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去年，中国首次宣布在公海自主禁渔，接下来将如何部署“可持续”的远洋渔业引人遐想，正在制定的“十四五”渔业发展专项规划将提供更多答案。

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维护海洋权益”，“十四五”则变被动为主动，提出“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寻求发展“蓝色伙伴关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环境法中心主任副教授刘能冶分析，“中国过去更关注与沿岸国的合作，随着中国在远洋渔业、造船业等海洋产业中能力的增长，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也随着经验而增长，这种表述的转变可以说是‘海洋强国’战略的深化。”在极地治理上，纲要提出要在建设北极“冰上丝绸之路”，同时提高参与南极保护和利用能力。中国在2017年首次举办南极条约协商会议，2018年发布北极政策白皮书，在刘能冶看来，这是中国参与极地治理的标志性事件。他说在极地尤其是南极治理上，国际上一种声音是强调保护，而中国是强调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他认为“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的表述是对过去几年中国南北极政策的平稳延伸。

在海洋环境治理上，今年的纲要提出要深化与沿海国家在海洋环境监测、保护与科研上的合作，加强深海战略性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调查评价。而在家门口，中国将加码对入海污染物的控制。纲要提出建立“陆海统筹”机制，将入海河流域、河口与近岸海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扩大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范围，保障入海河流断面水质。这些工作的最终成效需体现为近海环境和生态的改善，未来5年，生态环境部将以一个叫做“美丽海湾”的全国性创建活动进行评价。除了水质改善，它还关注海湾内物种及其生境的恢复，以及自然岸线和湿地的保护和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目前正在制定中，这是该领域首份专项五年规划，据生态环境部透露，“美丽海湾”将是其中的总体目标，计划到2035年全国1467个海湾都能建成“美丽海湾”。国内海域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是对世界海洋的一种贡献。

笼罩在“两会”上空的雾霾本该在15日消散，但这天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12省市却迎来了一场10年来最严重的沙尘暴。媒体报道，3月15日早上的沙尘暴起源于蒙古国南部，在中国北方多省沙尘叠加后到达京津冀地区。研究显示，大量沙尘的产生很可能与气候变化带来的热浪与干旱有关。闵庆文说，这场沙尘暴再次说明我们不可能独善其

身，而是要输出生态理念和生态技术，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开展环境外交，与其他国家结成“共渡”的关系。

探索改革

从十四五看2035：目标难度与改革对策

英国 金融时报中文网 2021年3月30日

十四五规划远景目标是中国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以不变价计算，未来15年需要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73%。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自2019至今，就中国未来2021—2035年各种条件场景的经济增长趋势，进行了长期、动态、大型和不同方案的模拟，结果显示年均经济增长达到这一速度难度相当大。同时就能够获得新增长动力进行了不同方案的反复模拟，发现还有一些国内需求空间和增长潜能可以通过重大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安排予以挖掘和激活，在2035年完全可以实现GDP或者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

一、经济自然增长状态下年均速度不可能达到4.73%

未来经济低速增长源于要素投入收缩、市场需求能力不足和债务货币体系发生大的问题。

（一）生产方面缺乏中高速增长的动力

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潜能由市场自动调节创新能力而实现，体制转轨国家则需要安排体制不断改革和发展举措寻求增长动能。实验室从投入产出、均衡增长和经济安全等角度推算，如果没有较科学和精准的大力度体制改革和重大发展战略安排，任由经济自然增长，不论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间如何替代，其投入及其广义技术进步产出决定的2021—2035年期间年均GDP增长在高3.31%、中2.5%和低1.81%之间。其分解如下：

1. 劳动力投入的收缩是一个未来15年基本能够确定的要素投入变量，劳动力将从76521万人下降到65665万人，投入量年均负增长1.08%，导致GDP年均负增长0.54%。

2. 未来资本要素按照高中低三种情形投入，其对GDP增速贡献部分年均分别是2.85%、2.35%和1.84%。从近几年投资增长低迷和负增长来推断，未来较为乐观的7.16%—4.08%增长趋势，需要很大努力才可以实现；如果没有重大改革和发展措施，落入6.16%—3.08%增长状态的概率较大；而悲观5.08%—2.08%趋势，也不是没有可能。

3. 广义技术进步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按照高中低三种情形，未来15年平均分别增长1%、0.7%和0.5%。就未来的经济增长，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教育、人力资本、技

术产业化、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有爆发式动能，以推动未来的经济中高速增长。但是，1970到2012年间，美欧日TFP增长率年均分别只有0.9%、1.0%和0.7%，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也只有1.6%。而且TFP没有J型指数式增长，是一条平缓接近平行的曲线。我们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3.1%的TFP增长，发现只有1%左右是广义技术进步实现的，2.1%是体制改革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改善要素配置所实现的。

（二）需求侧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扭曲机制

农村居民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和城镇居民住房支出过重对经济增长、消费需求拉动力的挤压。

202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84142亿元，即使50%留给农民，被转移的农村居民收入为42071亿元，使农民失去33657亿元消费支付能力；房地产单一渠道供给的高房价又挤压了城市居民36458亿元的其他消费支出能力。2020年工业产能过剩13.15万亿元，其中消费品约6.58万亿元。2020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和住宅资产拥有分别是农村居民的11.65倍和19.22倍。

实验室对各类收入、支出和消费流的模拟分类和观察，如果这一国民经济香港化的畸形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体制对“收入—支出—消费”流程扭曲得不到改革和疏通，未来即使生产侧有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等形成较大的财富生产能力，但是消费需求侧不会有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中高速增长容量。

（三）未来经济增长安全方面面临的风险

市场经济国家中对于债务及相关的货币供应，土地房屋资产为其信用和币值基础，是一个必然的保证机制。

从全球看各国经济发展正在向GDP高债务和货币化模式转型。中国全部非金融债务占GDP比率从1995年的101.7%上升到了2020年的272%，债务存量质量较差，未来政府还本付息压力和中长期养老收支缺口较大；M2供应占GDP比率从99%上升到了217%，水平已经高于许多主要经济体。未来15年，由于人口结构的老化和支撑低迷经济的需要，债务与货币占GDP的比例毫无疑问地会继续攀升。

然而，中国目前除了350亿平方米左右的城镇住宅可交易可抵押外，农村500万亿元左右的各类土地和宅院，城市和县城300多万亿元的土地实际上没有二级市场，城乡大规模的土地宅院不可交易和抵押，不能成为稳定高债务和多货币经济的信用保证和币值之锚。实验室模拟，如果不推进农村土地宅院资产化和不放开城市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将会因缺乏对债务链和货币币值安全的资产类基础信用保证，未来债务链断裂和人民币币值发生剧烈波动，经济增长成果不断发生俄罗斯等国发生过的断崖式萎缩可能是大概

率事件。

以上要素投入潜力、国内需求不足和债务货币安全方面诸问题若不能解决，结果是中国不可能在2035年成为初步现代化的国家。

二、稳定安全中高速增长来自大力度改革及发展举措

1978年以来的三次经济增长速度上行，都是由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启动实现的。从投入产出方面看，如果要想获得更多一些新的增长动能，必须要有精准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重大的发展战略举措。

（一）增长乏力的最重要原因是要素体制性闲置和低利用

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增长潜能的来源，重要部位是体制扭曲形成的规模巨大各类闲置低利用要素（下称体制扭曲性剩余要素）的激活。保守估算2020年的状况是：（1）国有企业中体制性剩余资本要素规模为827010亿元，占全社会总资本的16.95%。（2）城乡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农村16000万人，国有行政企事业单位1500万人，共计17500万人，占总就业劳动力的22.86%；（3）全国体制性城乡剩余建设用地15189万亩，占城乡全部建设用地的25.11%。

2020年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房屋等要素闲置低利用造成的产出损失分别为6.3万亿元、4.92万亿元和5.34万亿元，高税负使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业资本间的错配，也造成了6266亿元产出损失，低效率损失总计为17.19万亿元，为当年GDP的16.92%。也就是说，通过改革消除这些要素配置和利用的低效率，未来15年将会形成平均1%左右的新增长潜能。

（二）新增长潜能来源与大力度改革与发展举措安排

未来15年，从大力度改革看，要素和资源方面，是各种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土地房屋的资产化；从城镇和乡村来看，前者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后者是土地要素市场化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相组合及其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货币和财富化；就改革周期的布局看，可以选前十年一次性完成，也可以分前7年重点为农村体制改革，后8年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要任务。

国内首个个人破产综合应用系统深圳正式上线

姚志东 香港商报网 2021年3月1日

3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正式实施。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个破条例实施专题新闻发布会，并宣布深圳法院“破茧”个人破产综合应用系统正式上线运行。深圳市中级法院副院长龙光伟出席发布会并介绍个破条例实施筹备情况，深圳市中

级法院副院长胡志光出席发布会并宣布深圳法院“破茧”个人破产综合应用系统上线，深圳破产法庭庭长曹启选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个人破产条例》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个人破产和企业破产在深圳合流并行，深圳成为破产制度综合试点的第一试验田。

龙光伟介绍，深圳市中级法院着力打造全国首个破产一体化办理平台，集合“深·破茧”微信小程序、个人破产案件信息网、破产管理人工作平台，实现人民法院、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破产管理人、破产程序参与者全流程在线交互、无纸化办理，同时推动利用区块链技术联通有关部门和机构，逐步实现破产事务一网通办。

深圳市中级法院及时加强对破产管理人协会的培训指导，支持破产管理人协会于今年2月启动面向社会公众的个人破产案件免费咨询服务，为希望申请破产保护的個人提供专业支持。同时深圳破产法庭持续加强普法宣传和诉讼服务力度，推送个破条例系列解读文章、鹏法微课堂法官解读，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上线“深·破茧”小程序，印发便民问答指南、诉讼材料清单、信息化操作手册等，为广大群众寻求破产程序保护提供便利，做足准备。

实现所有业务统一入口

据胡志光介绍，该系统首创“小程序+PC端（电脑）”同步开发模式，实现法院裁判、管理人办理、机构保障、公众监督“四位一体”的信息化体系，具有统一门户、综合办理，构建“小程序大生态”协同模式，深度应用区块链技术三大技术特点，并实现了三方面功能。

一是高起点的系统建设“一体化”。平台整合了各相关业务系统的功能，将电子卷宗、送达等小程序化，实现了所有业务的统一入口。

二是破产业务办理“无纸化”。平台以电子卷宗为基础，以司法链为纽带，实现网上立案、网上听证、网上拍卖等全流程全要素无纸化办理，满足了法官、破产管理人、当事人具体需求。

三是破产办理全流程“阳光化”。平台对接全国法院三大司法公开平台，依法对个人破产案件的审判流程、裁判文书、听证庭审等重要司法信息予以公开，为有效推进个人破产信息登记公开制度提供支撑。

胡志光强调，《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颁布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十分关心配套的信息化建设，广东省高院人民法院第一时间成立个人破产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广东省法院破执庭，立案庭，信息中心具体指导，深圳法院相关部门通力协作，为“破茧”个人破产综合应用系统开发提供了强力的组织保障。市中级法院将在一期系统建设的基

基础上，继续推动二期系统建设。

债务人的豁免财产不得超过二十万元

曹启选表示，豁免财产制度是个人破产法律的核心制度，关系到债务人及其家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和生活保障，各国各地区的规则都受到其社会经济、文化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变动调整频繁，也一直是各国学术界、实务界争论的重难点。深圳中级法院在参与条例起草和实施筹备过程中，对豁免财产制度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在个人破产改革推进的初期将在具体个案中加强探索，在取得具体实践经验后再进行总结。

目前，深圳破产法庭专业法官会议结合我国国情和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经过认真研判，初步对具有共通性的技术问题形成了基本意见，比如，豁免财产应当是没有所有权争议或者未设立权利负担的财产；豁免财产的二十万元是指保留额度，而非财产本身；费用和物品两大项的各自保留上限一般为十万元；为债务人及其所扶养人预留的合理生活费用应当参照深圳市低收入居民社会救助认定年度标准来确定，合理期间一般不超过6个月，子女基础教育、长期医疗等支出应当按照实际支出等等。

经济广角

穿越基数幻觉看中国经济

香港 信报网 2021年3月19日

2021年1至2月的经济和金融数据已经陆陆续续公布了。不出所料，按年增幅非常强劲。

如超过60%的出口累计增幅以及35.1%的工业增加值累计增幅，是这些数据有纪录以来的历史新高，33.8%的零售销售增幅是1995年1月以来的高点，而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幅也同样是近17年以来的高点。

不过撇开去年第一季疫情高峰所导致的基数效应，今年春节错位以及就地过年三态叠加带给我们的干扰之外，中国1至2月的经济反弹真的如表面数据看起来那么强吗？我们又该如何穿越基数幻觉，更直观地把握中国经济走势呢？笔者认为统计局公布的两年平均按年增速数据带给我们不少启示，笔者在这里分享几点观察。

就地过年提振工业产出

第一，中国的工业活动复苏是超预期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按年增速达到8.1%，这个增幅是201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8.3%之后的最快增幅。中国工业活动近期的快速复苏主要受惠于两个因素，包括疫情期间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上升，以及就地过年对工业生产的提振作用。根据统计局的调研显示，春节期间工业企业平均放假天数7.5

天，少于正常年份。显示就地过年对工业产出的支持作用非常显著。

城乡消费趋势现背驰

第二，就地过年的影响，除了体现在工业上，对消费也产生了影响。春节期间，中国电影票价大幅上涨，电影票房创下历史新高，容易给人造成中国消费强劲的错觉。事实上，就地过年对城乡消费产生了结构性变化。今年1至2月份，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3.4%，而乡村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仅1.3%。城镇消费增幅远超过农村消费增幅，与近几年趋势出现了背离。显示就地过年对消费的影响。

第三，虽然，工业数据的强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并不如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劲。固定资产投资两年平均增长仅1.7%，是低于过去几年的水平。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为3.2%，也同样不高。尤其分类来看，并不是所有分类行业都回到疫情前水平。如餐饮收入两年平均下降2%，而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下降3.4%。这也显示后疫情时代的复苏并不均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2月反弹到5.5%。

宏观政策料不急转向

相对于增长类数据已经显示出的基数幻觉。金融数据的基数幻觉尚未完全到来。2月金融数据中最受关注的可能是货币供给M1和M2的剪刀差。2月M1按年增幅由1月的14.7%大幅回落至7.4%，而M2增速则由9.4%走高至10.1%。此次M1和M2走势的剪刀差并不是企业投资意愿下降，毕竟2月企业中长期贷款大幅上升至1.1万亿元人民币。这可能更多是由于企业活期存款和居民存款之间的转换造成的。而春节错位以及就地过年都可能是这种转换的主要因素。由于去年3至5月，中国加大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社融增幅基数显著增加。因此大概率3月开始基数幻觉可能将导致信贷和金融数据增幅回落。

总体来看，由疫情、春节错位和就地过年带来的三态叠加，为我们解读中国数据带来了很大的干扰。1至2月增长类数据的强劲复苏并不如表面显示的那么乐观，有些行业并未回到疫情前水平。而即将来临的金融数据的基数幻觉也并不意味中国收紧政策。

总体来看，穿越基数幻觉后，近期数据支持中国宏观政策不急转向的判断。

中国距离制造强国还差多远

新加坡 联合早报网 2021年3月8日

中国距离制造强国还差多少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圩昨天给出一个新答案：至少30年！

如果是个普通官员这么说，恐怕不会引起多大关注，甚至可能因“不合时宜”而招

来不少质疑。但苗圩不是普通官员，他不仅是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还当过10年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去年8月才因年满65岁转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而且，苗圩是在全国政协大会上，面对高层领导和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作出这一判断。他说：“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早在2015年，时任工信部部长苗圩就说过中国需要30年才能成为制造强国。不过，官方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为中国制造业设计了10年发展路线图，强调要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三大转变，推动中国到2025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迈入制造强国行列。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中国制造2025》逐渐成为美国打压中国的一个借口。中国官方也很少再提这一规划，但规划仍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指南。

根据官方去年制定的2035年远景目标，中国将在未来1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副总理韩正去年11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将持续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四化”；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

苗圩昨天明确指出，中国至少要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才能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

他坦言，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基础能力依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子”风险明显增多。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得过早、过快，不仅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弊端，苗圩认为，“最根本的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比如，企业公平竞争机制不健全，一些隐性的市场准入限制依然存在，企业税费负担依然较重，金融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亟待加强等。中国社会对加快发展制造业并未完全形成共识，忽视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用服务业代替制造业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等观点和看法还有一定的市场。中国要保持战略清醒，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深刻认识差距和不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保护几十年来攒下的家底。

按照联合国制定的产业标准，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并在2010年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大而不强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短板。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在芯片制造等高科技领域深感被人“卡脖子”的痛楚。公众虽然认识到中国距离制造业强国还有很长的路，但不少人认为，中国将在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届时必然成为制造业强国。因此，苗圩昨天提出中国还有“至少30年”的差距，不仅有些出人意料，对某些中国制造很快将“赶超美国”的乐观情绪，也是一针清醒剂。

去年12月25日，中国工程院发布的《2020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成为整体提升最快的国家；但从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来看，美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依然持续高于各国，处于第一阵列，综合优势突出；德国、日本稳居第二阵列，相对优势明显；中国、韩国、法国、英国处于第三阵列。

《报告》中的“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下设四个一级分项指标：“规模发展”“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其中，除规模发展外，其余三项是衡量制造强国的主要标志，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差距所在。2019年，中国的“规模发展”分项数值整体增加最明显，但在另外三项指标的合计值排名中，中国位列第六，与美国、德国和日本仍有较大差距。

而且，在“持续发展”这一指标中，中国的分项数值继2017年后再次出现下降。2018年，中国制造业销售利润是6.19%，研发投入强度为2.32%，而2019年制造业销售利润是5.23%，研发投入强度为1.45%。企业运营困难是导致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下降的原因之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单忠德在解读这份《报告》时说，中国需要“静下心来”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个慢活，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关注。

科教文卫

武汉市将全力以赴创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香港 凤凰网 2021年3月31日

3月30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加快打造“五个中心”，建设现代化大武汉系列新闻发布会之三——全力以赴创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科技创新大会的精神，详细介绍武汉市创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相关举措。3月29日，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全市科技创新大会。众多重量级在汉的院士及专家走上红毯，接受来自城市的最高礼遇。会议以“十四五”期间创建国家科技中心为目标，对推动武汉市科技创新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

武汉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盛继亮介绍，科技创新大会宣布实施武汉市科技创新「十大行动」，对全市科技创新十个方面的重要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十大行动的主要内

容：一是实施创新平台建设行动，二是知识创新强基行动，三是科技企业倍增行动，四是武汉英才“拔节行动”，五是核心技术攻关行动，六是成果转化加速行动，七是高端产业领航行动，八是科技金融赋能行动，九是全域创新协同行动，十是创新生态优化行动。十大行动既有目标任务，更有对目标任务的清单化和项目化。并对今年的工作以一区一表的形式明确了各区的具体任务。

科技创新大会发布了总金额1.35亿元的首批市级科技重大专项“揭榜挂帅”项目榜单。榜单项目将列入市级重大科技专项，得到每项最高3千万元的财政支持。在此基础上，武汉还将探索推行企业出题出资、政府配套激励等方式，邀约“全球大脑”，共谋武汉创新发展的智慧方案。欢迎海内外有实力的专家和科研团队，组成以武汉企业牵头的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前来揭榜。

大会还签订了牵头组建单位与落地城区合作共建湖北实验室协议，启动了名校名企名城合作创新合作的新模式。为创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人才支撑，武汉还提出打造国内一流的创新人才集聚高地。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武汉市人社局局长孙志军表示，今年将重点推进人才市场化评价机制改革，人才能不能发挥作用，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影响，深化战略科技人才邀约和企业举荐人才制度，建立人才“随来随评、及时认定”机制，把对人才的评价权交给用人主体。

动漫文化疫境线上拓生机

新加坡 联合早报网 2021年3月31日

疫情重创动漫实体活动，本地角色扮演爱好者透过网店销售周边商品，开拓主持、直播等机会，找到迈向职业化的平台。

在冠病疫情的冲击下，大型动漫展延期、取消或者转而移驻网络平台等情况频频出现，让角色扮演等动漫亚文化在本地面临低潮期。

角色扮演（Cosplay）近年来大有崭露头角之势，职业Cosplay以及相关的网红、直播、YouTuber等由动漫游戏产业衍生而来的新兴职业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在新加坡举办的动漫实体活动越来越多，包括从2002年开始举办的漫展（Cosfest），从最初200人出席，至今已成长为万人出席的盛会；始办于2008年的新加坡亚洲动漫节（C3 Anime Festival Asia）如今在业界颇具声望；在2018年，滨海湾花园也开始设立动漫花园（Sakura Matsuri: Anime Garden）吸引人气。

但在疫情的冲击下，去年本地有十多场线下动漫活动被延期、取消，其中包括新加坡国际动漫展、首届Gamescom Asia游戏展等。就连最具影响力的“世界Cosplay高峰会”

也取消了去年在名古屋的线下活动，改在线上举办。

从中学时期开始，凯蒂（Katy）与Cosplay相伴已有九年。与主流职业不同，经营Cosplay事业不能透露真实姓名，而且要尽可能地把角色形象投射出来。

近年来，她正在努力经营并且期待将自己的爱好职业化。她一个月的工作量包括制作80至100张Cosplay照片，但在阻断措施期间无法出门进行模特、拍摄等工作，工作量减少了七成。此外，一些有意合作的商家也受到疫情波及，凯蒂各方面的赞助因此减少。

“我们须要从其他方面来弥补损失……人们看待Cosplay总是会联想到大型线下活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有许多工作是在线上，包括售卖周边产品等。”

凯蒂说，参加漫展是与粉丝见面互动的好机会，而且能在摊位售卖自己的周边商品。不过这些收入来源本来就不稳定，反而网上的盈利渠道越来越多，而且她可以利用网店商品的销售量弥补收入。

职业化须平台支持

曾代表新加坡赴日本2019年世界Cosplay高峰会的莉提（Rithe），把Cosplay当做职业经营。六年来，莉提一度因为Cosplay“Fate/Stay Night”动漫系列在圈内备受瞩目。她穿戴的服装有不少是自己亲手制作，造工更复杂、细致的服装的造价可以达到300元左右。这份投入是出于兴趣，但莉提十分清楚她需要更长远的职业规划。幸运的是，莉提如今加入木棉花（MUSE）的平台从事Cosplay、主持、直播等工作。在业界，像莉提这样的全职Cosplay是凤毛麟角。

莉提受访时说，木棉花鼓励她去做不同领域的尝试，开拓人们对二次元文化的理解，这样的平台将来或许能帮助更多Cosplay爱好者走向职业化。“人们向来不看好Cosplay职业化，因为本地市场太小，出场费没有市价，而角色的服装、道具都须要自掏腰包，因此本地的职业Cosplay真的不多。”

动漫市场小众

Cosplay不仅考验角色扮演者，对摄影水准的要求也很高。本地虽然有摄影工作室开辟Cosplay相关的业务，但还没有出现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成立于2016年的LunarWorks Studio摄影工作室这几年来就为本地Cosplay爱好者提供摄影棚租用服务。创始人吴依桦透露，在Cosplay摄影方面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工作室的经营，目前大部分的收入来源还是依赖于拍摄主流的家庭照、婴儿写真等等。

人们可以以30元租用摄影棚三个小时，但吴依桦说，只有少于一半的的顾客是为了拍摄Cosplay而来。在疫情期间为了确保安全距离，工作室不得不设立五人限制，摄影棚的租用档期也从每天四个减少至三个。吴依桦说，顾客当中有不少是学生组团前来，

考虑到他们的消费水平不高，因此摄影棚的租金这五年来都保持不变。“人们普遍对Cosplay摄影有误解，以为它的成本很低，但是从摄影器材、艺术效果以及摄影经验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吴依桦指出，Cosplay的市场仍十分小众，职业从业者很少，通常是在一些企业推销产品时才会带来相应需求。

三农问题

激发“三农”潜力要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香港 中评网 2021年3月22日

循环融合是城乡关系运动变化的历史趋势。城乡经济模式往往随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不断调整，反过来又形成生产力向更高水平跃升的动因。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这是基于城乡发展规律，对优化城乡关系提出的新要求。从分割到依存再到循环，中国城乡经济关系不断向更加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方向演化，同时又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部署在“三农”领域的重要体现，不仅有利于提升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效能，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都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构建城乡共生关系

城乡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本质上在于构建起城乡共生关系，实现两个异质性空间的要素对流、产业耦合和供需适配。

一是城乡要素对流。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是推动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的内在动力，也是实现城乡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城乡要素能否高效对流，不仅取决于要素流动渠道的畅通程度，还取决于要素价格市场决定程度和收益能否实现合理分配。面对“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拓宽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需要考虑不同要素属性、市场化程度差异，特别是农村土地等要素承载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同时，健全的要素市场功能极为重要。只有形成健全的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才能推动城乡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二是城乡产业耦合。城乡经济循环不仅是产品和要素的交换，而且体现在产业转移和融合过程中共生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成，产业关联畅通是城乡经济循环的重要方面。

其中，产业转移是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的重要途径，既包括产业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的转移，也包括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城镇化带来产业和人口的空间集聚，而当城镇化达到一定程度，由于市场拥挤效应和要素成本上涨，会导致部分不依赖城市集聚效应的产业或产业链环节向乡村转移。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交通条件改善，改变了时空距离，强化了城乡空间关联效应，为城市部分产业功能的转移和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三是城乡供需适配。畅通经济循环的本质，是构建高效对接机制和匹配结构，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动态平衡。城乡经济循环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为建立在经济分工基础上的城乡商品交换，农产品和工业品价值在交换中得到实现，而利益分配结构会因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条件产生不同结果。随着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和生产技术的变化，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不仅需要保持总量平衡，而且更要求结构匹配，这需要同时提高城乡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并通过现代流通提高供需匹配效率，从而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

三大堵点有待破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取得重要进展，城乡经济循环动能不断积累、条件更加充分，但新型城乡关系还没有完全确立，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存在不少堵点。

一是城乡要素流动面临制度性障碍。中国城乡要素不平等交换和要素单向流出农村的局面已经大为改观，但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没有被完全破除，渠道还没有全面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成本较高，要素错配现象还比较多。对农业农村而言，大量要素流入城市，资金、人才、信息等要素无法向农村汇聚，造成农业生产率长期不高；对城市而言，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资产要素权益流转却不同步，导致土地供求关系紧张，用地成本不断攀升。由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不健全，农村要素资源无法得到有效盘活，不仅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影响了社会资本、城市人口入乡的积极性。

二是城乡产业关联存在链接“断点”。技术变革为城乡要素跨界和产业融合创造了条件，使城乡产业互动性、互补性不断增强，但中国城乡产业转移和产业融合发展还面临诸多障碍，产业关联效应和融合水平不高。部分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向乡村布局时，大多面临要素保障不足的难题；城市物流、金融、信息等专业服务，由于农村服务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向农村拓展渗透并不顺畅。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县域经济发展长期滞后。

县城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空间，也是城乡产业互动融合的关键场域。目前县

城产业配套设施普遍不足，缺乏承接适宜产业转移和服务带动乡村的能力，导致其联动城乡经济的纽带作用发挥不充分。

以系统动态平衡理论推动中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台湾 新浪网 2021年3月16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些新战略，为促进我国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农业农村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成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

从系统动态平衡理论出发，我国在农业农村发展战略和顶层设计层面，既要保证农村发展战略和制度框架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承继性，又要把握时机，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对阻碍农业农村发展的制度痼疾进行及时革除。

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农业农村发展要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相结合，要与中国未来高质量均衡发展相结合。“双循环”战略下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顶层设计层面主要涉及三大协调。

第一，城乡协调。要进一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尤其是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从而助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第二，工农协调。新技术发展给工业产业部门和农业产业部门协调互补、融合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乡村新型工业化前景广阔，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一二三产业融合获得空前历史机遇。

第三，区域协调。重视边疆地区、相对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农业农村发展，加大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促进各要素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流动和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从顶层设计层面看，“三大协调”的关键是促进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和合理配置，促进金融要素和人才要素向农村回流，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使农村活力得以充分激发。

未来中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包含三大制度板块：

1、以新型城镇化和土地制度创新为抓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第一，进一步释放新型城镇化红利，消除阻碍城镇化深入推进的各种制度壁垒。中

国未来要坚持以“小城镇建设”为核心发展新型城镇化，促进县域城市周边“核心城镇”的发展，通过“核心城镇”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的完善和人才积聚，使县域周边形成富有生机与活力、与农村经济社会保持良好互动的经济增长群和生活服务群。小城镇建设要注重解决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进而建立统筹城乡公共服务、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治理的城乡互动机制。进入小城镇的农村人口，一方面逐步享受与市民均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一方面因自身与乡村的天然联系，在小城镇和农村之间起到中介和桥梁作用，进而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增强乡村治理效能。

第二，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新模式，使农民分享城镇化和乡村工业化红利。未来，为进一步推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要进一步打破集体土地的种种限制，充分释放农村集体土地要素活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加强农村土地统筹规划，优化用地结构和布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探索农村土地产权交易所等形式，促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跨区域交易和市场化配置。

第三，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创新，推动各种要素回流农村农业。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制度引导与激励，鼓励优秀劳动力和人才回乡；另一方面通过农村金融机构发挥积极作用，鼓励资本回乡为农村发展助力。同时，制度和政策还应鼓励城市精英下乡，使城市各类人力资源为农村带来新的资金、技术和理念，进而盘活农村各种要素。唯有把原来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要素流动转变为城乡之间的双向要素流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藩篱才会被拆除，城乡的协调发展才会实现。

2、以“后脱贫时代”治理相对贫困为抓手，以“制度普惠”理念推动欠发达地区全面发展

第一，消除绝对贫困为中国减贫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大规模脱贫攻坚提高了贫困人群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欠发达地区的整体收入水平。同时，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欠发达地区的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状况、农村产业发展水平、教育和医疗设施等都有了显著改善，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促进了经济增长，提升了消费需求 and 投资需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扶贫既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也是重要的“增长引擎”，故而民生就是增长，而且是“好增长”，是“可持续的增长”。

第二，治理相对贫困的关键：从“制度二元”到“制度普惠”。“制度普惠”不仅对治理相对贫困至关重要，而且是激活农村基本消费需求、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可持续均衡发展的关键对策。为此，我们必须深入变革农村教育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制度、乡村社区管理的财政支持制度等，努力使城乡公共服务实现均等供给、平衡供给，破除人为“制度二元”格局，争取实现“制度普惠”。

再者，随着农村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逐渐与城市居民相同，城乡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差距逐渐消失，我国在农村土地改革上的“后顾之忧”将大幅降低，土地所承载的“农村社会保障”功能将逐步消失。这为更深层次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农地大规模流转和集约化经营提供了制度基础。

3、以农村组织化和集约化经营为抓手，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第一，积极推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和升级。未来农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系统的政策支持框架。一方面，国家要完善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法律制度框架，进一步改善其内部治理，明晰其产权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规范其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国家应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市场开拓、产业链构建、基础设施和农业技术、人力资本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扶持。同时，各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进行土地流转和土地租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支持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组织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建立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与农民的土地交易和利益共享机制。

第二，通过土地制度创新推动集约化经营，培育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和现代化大农业集团。我国目前以小农生产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在与全球农业巨头的竞争格局中脆弱不堪。未来我国应进一步深化农业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推动土地流转，完善土地交易制度，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为现代化农业提供物质基础；在制度层面鼓励适度规模化的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快速发展，尤其鼓励农业产业链整合，培育大型农业企业集团，并使其能够在整个产业链上具备全球竞争力；引入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提高农村经营主体的抗风险能力，提高农村经营主体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组织载体。同时，我国还要积极借助农垦体系，发挥农垦作为农业现代化领军者和国家队的重要作用，通过国有农垦体系的技术创新和产业整合，打造中国自己的农业“航空母舰”。

社会观察

“好声音”催生“耳朵经济”

叶子 香港《亚洲时报》2021年3月24日

开车途中，父母打开广播，与孩子一起聆听名家散文；地铁上，上班族插上耳机，开启一段情节精彩的广播剧；睡觉前，播放一段满是笑点的脱口秀，缓解一天的疲惫……如今，收听音频节目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以网络听书、音频直播、知识付费等业务模式为主的网络音频模式已升级为“耳朵经济”。艾瑞咨询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长音频市场规模有望达到543.1亿元，2023年中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将超9亿。

收听场景更多元

“上下班路上，我常常听时事新闻类节目，了解最新的资讯。工作日午休时间，我就会学习一些商业、理财类的课程，给自己充充电。周末在家洗衣做饭时，我会打开一本小说听听，放松身心。”在北京互联网企业工作的白领小王是在线音频内容的忠实粉丝，对于在不同场合和时段听什么，她有自己的规划。“相比视觉冲击性更强的视频，音频具有伴随性的特质，能让眼睛和双手得到休息，也能帮我们将碎片时间利用起来，进行自我提升或娱乐休闲。”小王说。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20年4月发布的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有声阅读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31.2%的中国人有听书习惯，成年人的听书率为30.3%。而对中国成年人听书介质的考察发现，选择“移动有声App平台”听书的人数比例最高，为16.2%，其次是通过“微信语音推送”和广播听书。

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相关负责人接受本报采访时透露，自去年以来，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线上消费场景成为人们充实精神世界的刚需。无论是学生、上班族还是老人，无论是在出行、居家还是运动等场景中，人们都能够享受到音频场景带来的乐趣和价值。

据了解，有声书是音频平台用户最喜欢收听的类别之一。此外，年轻用户喜欢的广播剧、品质生活类专辑，宝妈必备的亲子儿童课，陪伴打工人的职场进阶、外语学习、商业财经类专辑位居音频平台畅销榜的前列。

智能终端来助力

在不同的场景里，人们收听音频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小王告诉记者，在通勤时她一般使用无线耳机连接手机App来听音频，在家里则会使用智能音箱来播放。深圳的周先生是慢跑爱好者，跑步时，他用智能手表来听各类播客节目。他说，这样跑步就有了陪伴，有时也能激发思考。

记者了解到，在线音频平台正在积极布局全场景的生态体系，从智能家居、智能音箱、智能穿戴、车联网等各类渠道分发音频内容，赋能生活场景，加快触达用户，通过提供便捷化的收听体验，助力音频生态繁荣发展。

易观《2020年在线音频平台生态流量洞察》分析报告显示，通过在智能硬件、App、小程序、移动网页等方面的布局，音频平台积极发展外部的内容分发出路。例如，喜马拉雅与阿里、小米、华为、百度、三星等深度合作，将有声内容渗透到生活中各个智能终端和场景中，先后推出智能AI音箱、AI听书耳机等。

专家认为，随着科技发展，将声音和汽车车载、智能家居、智能音箱、智能穿戴等智能硬件终端相结合，让音频得以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场景，将为“耳朵经济”进一步

带来发展空间。

内容生态是关键

从传统的电台节目，到相声、广播剧、有声书、脱口秀以及各种知识付费内容，在线音频平台将各种领域的内容聚合在一起，吸引了跨年龄、跨行业的诸多受众。广阔的发展前景与庞大的市场规模，造就了不少深耕听书和在线音频的移动应用，如喜马拉雅、蜻蜓FM、荔枝FM、樊登读书、十点读书等。

多家互联网企业纷纷布局音频产品。2020年，字节跳动推出番茄畅听，主打海量小说免费收听；网易云音乐上线全新内容版块“声之剧场”，主打IP（知识产权）改编的广播剧与有声书；近期，腾讯音乐收购懒人听书全部股权，也被视作进军在线音频行业的重要举动。

随着人们对音频节目的喜爱度提升、对知识付费的意愿提高，音频分享平台的供给侧改革也势在必行。喜马拉雅相关负责人对本报表示，2020年喜马拉雅内容品类已增至393类，新增内容涵盖众多新兴领域，包括二次元、萌系等娱乐内容以及演讲、科学史等个人提升内容。同时，喜马拉雅还推出了关爱女性成长、恋爱、美容养生等相关内容。未来，平台将精耕下沉市场，丰富新内容，不断获取新用户，形成健康可持续的音频生态。

业内人士指出，音频节目不仅要量大，还要质优，尤其是覆盖更多垂直领域和小众需求，保持有新意、有趣味、有思想的输出。只有保证内容上的竞争力，打造独家和富有平台特色的产品，才能吸引更多黏性高的忠实用户。

中国延迟退休不搞“齐步走” 体现灵活和包容特征

庄恭 香港新闻网 2021年3月14日

备受中国民众关注的延迟退休新政日前实施，并在实施的节奏上加以确立。专家表示，新政策实施确立以小步调理的节奏，不搞“齐步走”，体现了灵活和自主选择的包容特征。

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日前实施并明确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人社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表示，小步调整简单理解就是延迟退休改革不会“一步到位”，而是采取渐进式改革，用较小的幅度逐步实施到位，每年延迟几个月或每几个月延迟1个月，实施节奏上体现在总体平缓。

金维刚表示，原本满50岁退休的女性，政策实施后，第一年，变成50岁1个月或几个月退休。不同年龄段的人，退休年龄不同。以此类推，经过若干年过渡期完成改革。

可以确定的是，新政对于临近退休者来说，只会延迟1个月或几个月，不会出现一下子晚退休几年的情况。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延长退休年龄幅度会大一些，但未来有很长的过渡期和适应期。

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于1978年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获得批准。2012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提出，中国应逐步延龄退休，建议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目前实行的退休年龄为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

专家表示，无论从职业和工作岗位，还是就业稳定性和工作强度，以及个人身体状况、家庭需求和价值追求来看，都存在着较大差异，由此产生的相关诉求也不相同，有的人希望多工作，有的人则希望早退休。

此次出台的延迟退休新政，充分考虑了多元化需求。即在统一实施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保压力增加、用工及就业等现实国情、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沿革等情况，增加一定的弹性因素，允许个人根据自身情况和条件，选择延长或提前退休的具体时间，体现政策的灵活性和包容性。

金维刚认为，对于现有不同职业、地区、岗位存在的一些政策差异，新政实施后，会保持政策的延续性，确保政策调整前后有序衔接，平稳过渡。

他同时强调，延迟退休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非常多，需统筹谋划、协同推进。

一方面，过去一些与退休年龄相关的政策，要随着延迟退休进行相应调整；另一方面，延迟退休改革也会带来一些新问题和新的挑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及时跟进。而如何通过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大龄劳动者就业创业，更大力度对就业困难人员、特别是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帮助其再就业，以及如何进一步加大对大龄失业人员的保障力度，开发适合大龄劳动者的岗位等问题，均存在配套措施落实的较大空间，只有做到这些，才会确保延迟退休新政顺利进行，实现预期目标。

综合治理

创新国际合作 探索碳治理密钥

香港《文汇报》2021年3月19日

2021年3月15日，北方多地遭遇近10年来强度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沙尘暴。气象研究人员指出，这次沙尘暴的起源，主要是在蒙古国戈壁沙漠的中部和南部，以及内蒙古的中部和西部沙漠，由于蒙古气旋太强而产生了一个典型的、超强的、大范围的亚洲

沙尘暴。同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研究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沙尘暴其实充分说明了碳经济的切实意义，也说明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要意义。将碳经济指标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布局之中，其实也包含了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关键之法。

时隔多年，北方再次遭遇沙尘暴。这来自蒙古高原的沙尘暴告诉我们环境治理其实是一个国际问题，碳治理也必然要有国际视野。“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过程中，同样要注重创新和改革，“要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不仅要有科技手段的创新，也要有国际治理合作的进一步创新。

跨国合作治理效果佳

天津大学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教授指出，中国可以考虑当年韩国和日本与中国的合作模式，与蒙古开展跨国治沙合作，中国支付蒙古一些费用用于植树造林等治沙费用，减少沙尘暴奇袭下游的中国北方。张中祥教授强调，环境治理经济学除了“谁污染谁付费”准则外，其实还有“牺牲者付费”准则，即“受害者给造成危害的地方付费，让他们少做点恶”。因此，“如果北京通过自己财政横向转移支付给河北用于治理污染，那河北集中获得这个资源后其实可以在省、甚至在京津冀层面做更好的治理规划，治理效果会比一帮一手段更有效的同时，同样治理效果的费用会更少”。在笔者看来，张中祥教授的这一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提议，的确是“通过地方之间财政横向转移支付治理费用实现雾霾治理制度创新”。

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假设公共的效益和成本与私人的效益和成本相一致是不符合现实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私人和社会的收益和成本并不一致，并带来了科教文卫等具有外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果的正外部性，以及污染等使生产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的负外部性。因此，国家必须用津贴来鼓励科教文卫等具有外部经济效果的行业，用税收来消除那些具有外部经济负效果的行为。

政府作用利促最优化

更进一步地，可以用科斯定理来进行分析：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安排如何，市场机制都会通过当事人之间谈判来自动实现帕累托最优，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以及不同当事人的最优均衡状态。但是，具体的谈判结果并不重要——无论是由造成损害的一方向受损方赔偿，还是由受损一方向造成损害的一方补贴来减少损害，从理论上说，最后达成交易时的生产量和污染排放量都是相同的。不过必须承认的是，产权和归属不同会导致收入分配的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而政府的作用恰恰在于明确产权和保护产权，在于实现法律、规则、价格机制、货币和税收的稳定性、确定性、可靠性、透

明性和变更程序的权威性。

管理制度改革须创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曾经总结道，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十年间的跌宕起伏，贯穿其中的一个逻辑就是“成本的变化影响经济绩效”，“综合比较成本优势，成就了中国在全球化中高速增长奇迹”。因此中国经济突围的两个方向：“一是扭转成本曲线，特别是体制性成本上升过快的不良势头，争取通过深化改革再次大幅度降低成本，延续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比较优势。二是鼓励创新，培育中国经济的独到性优势”。可以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正是为了在这两个方面不断降低成本，不断深化改革，不断体制创新。

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到中国的碳中和解决方案，也要考虑到这种经验的辐射能力，环境问题不是区域划界可以处理的，必须要有区域间合作才能解决问题。

正因如此，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倒逼和推动管理制度、科技创新体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创新，或许是最迫切、最重要、最有效的创新。也正因如此，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才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也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进国际规则标准制定，建设绿色丝绸之路。”

安徽巢湖：东撤洪沟治理项目即将竣工

香港商报网 2021年2月24日

2月23日，从安徽省巢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为大力实施源头治理、管网截污、生态护岸，经过近8个月施工，巢湖市黑臭水体治理一期工程东撤洪沟治理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预计4月下旬竣工验收。

据了解，东撤洪沟治理项目区域全长2.83公里，位于巢城东侧，从巢湖汽车站北侧往南至新奥加气站东侧附近。主要包括清淤清杂、沿河截污管道、沿河护岸工程及上游湿地工程等。

据介绍，沿河截污管道共计2200米，管道类型为DN1000、DN800及DN500，其中穿堤段2处，沿河排口22处，目前已全部施工完成。生态挡墙总计1700米，结构形式包含生态砌块挡墙、素混凝土挡墙及植草坡，挡墙主体，目前已全部完成。生态湿地结构内容包含前置生态塘、潜流湿地、尾水植物塘，主要采用物理、生物净化的形式，净化东撤洪沟上游水源，目前生态湿地土建结构已施工完成。

我们注意到，该工程的护岸工程采取生态护坡，相对于以往的水泥护坡具有通水性，

它的迎水面可以透水；其次，生态护坡采取的材料是卵石，可就地取材，避免了对自然的破坏，枯水期还可以植草，相当于生态绿植与透水结合起来，更环保更具观赏性。

据安徽省巢湖市东撤洪沟治理项目负责人韦雨介绍，东撤洪沟片区工程项目总投资3500万元，建设工期8个月，“东撤洪沟治理前抗洪标准只有5年一遇，在经过底部淤泥清理，沿河清淤清杂，河道拓宽后，每个过水断面的面积相较于以前增加了3-5倍，抗洪标准可以达到40年一遇。”他说，经过初步治理后，东撤洪沟的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目前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预计4月底竣工验收。项目完成后，将以消除黑臭水体为目标，达到景观水的标准，并集防洪与生态于一体，成为巢城东部一道靓丽的城市风景线。

“房住不炒”实招落地 多地严查“经营贷”违规入楼市

香港 紫荆网 2021年3月15日

多地金融监管部门对涉房资金精准调控，严防消费贷、经营贷等资金违规流入楼市。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深圳市相关金融监管部门日前召集多家商业银行开会，要求各银行排查经营贷流入房地产市场情况。此次排查的内容包括2020年5月1日以后发放的1000万元以下的普惠口径贷款，以及以个人名义申请的房抵经营贷（不限金额）。

房地产金融监管升级的同时，银行贷款流向管控也趋严。多家银行表示加强信贷业务全流程管控，且一旦发现有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将立刻收回贷款。业内人士表示，社会上某些机构或个人宣称可套取银行贷款资金，其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对涉嫌违法违规的中介，有关部门应严肃处理。

多地对涉房资金“精准调控”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多地金融监管部门近日已经行动起来，对涉房资金进行精准调控，严防消费贷、经营贷等资金违规流入楼市。

2020年，整体融资环境较为宽松，利率下行，部分人有冲动利用利率较低的消费贷、经营贷等资金购买房产。以“经营贷”为例，据了解，2020年，不少银行的房抵经营贷利率降至4%以下，个别优质企业甚至能拿到低至3.65%的利率，对比北京同期的房贷利率，“利差”直观可见，且可以先息后本还贷。“经营贷”本身是为了支持小微企业创业发展，但是部分资金却摇身一变流入楼市，实属“好经歪念”。

业内人士表示，必须要强化相关监管，对违规资金流入房地产应该公开严肃查处，降低寻租空间。

除了3月11日深圳市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召集辖内主要商业银行开会部署排查工作之外，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3月12日印发的《2021年上海信贷政策指引》也强调，金融

机构要合理控制房地产贷款增速和占比，加强个人住房贷款管理，严格审查贷款人个人信息的真实性，切实防范消费贷款、经营性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广东银保监局日前也下发《关于组织辖内银行机构开展经营性贷款、个人消费贷款风险排查的通知》，要求辖内银行机构围绕授信调查、授信审查审批、授信后管理、第三方机构业务合作等各个环节开展全方位风险排查。

中介包装企业套取资金违法违规

多家接受记者采访的商业银行表示，已经通过严格经营贷款主体资格审查、强化信贷资金流向监控等措施严防经营贷资金流入房地产等违规领域，且一旦发现有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将立刻收回贷款。

不过，多位商业银行人士也表示，在贷款支用环节，银行会审核资金用途证明材料及贸易背景真实性，避免向无实际经营和经营流水不真实的企业发放贷款。但现实中确实存在个别中介“推波助澜”，教唆客户包装企业，并通过多次流转的方式规避银行监控，甚至有中介公司对购买壳公司等服务明码标价。

记者曾接到推荐贷款的中介电话，当记者问及所出贷款是否可以用于买房时，该中介介绍，他们会提前将所需的票据做好，可以直接用于购房。该人员还称，“接受新公司、新股东、新法人”、“刚离异、刚过户、均可操作”等，可准备“全套资料”。

“社会上某些机构或个人宣称可套取银行贷款资金，其属于违法违规行为。此类违法违规行为有可能造成自身财产损失，并对个人信用产生不利影响，请市民朋友切勿轻信。”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金融部副总经理范宝铭表示。

防堵这些“偏门”，银行审核也在持续趋严。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个贷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刘上海表示，在办理经营贷款过程中，做实做细贷前调查与合理授信，从严审核借款人经营实体的经营情况，认真评估借款人资金需求的真实性与偿债能力的可靠性，不支持近一年内新购入房产作为抵押物，从源头上确保业务背景真实合规，保证信贷经营稳健合规发展。

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银行贷款资金流入房地产监管，光大银行一直抓得很严。例如通过系统资金监管和人工抽查的方式，排查资金流向是否合规。另外，银行会定期排查贷款发放后，借款人及其配偶或者保证人是否存在新增房贷记录，或者通过查档查询是否存在新增住房的情况。一旦发现贷款资金流入房地产，银行会要求借款人全额归还银行贷款。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小微金融事业部相关人士表示，贷前加强借款主体资质审查，不向无实际经营和经营流水不真实的企业发放贷款，对于实际经营企业成立或受让时间短

的借款人进一步严格审查。

客户违约挪用贷款将被列入“黑名单”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经营贷款违规进入楼市，无论是对借款企业还是购房者来说，都存在诸多风险隐患。一位国有大行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贷款材料造假存在法律风险。客户通过提交虚假材料的方式骗取经营贷款，一经查实，将存在被依法追究骗取贷款罪等刑事责任的法律风险。另外，无法按期提前归还贷款的客户或将面临银行诉讼、抵押房产被查封等风险。同时，违规客户还将被列入黑名单，可能影响客户后续在银行继续申请贷款。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已经有个别借款人因违规使用经营贷而被银行提前收回贷款。

部分银行业人士也坦言，一般情况下，银行只能核查本行资金，对于跨行资金划转确实无法做到有效监测，这也就让部分人钻了空子。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也建议，监管部门可运用监管科技手段，打造一个跨行的、全面的系统，来进一步提升监测涉房资金流向的能力。他还表示，监管部门也可通过一些典型的案例，来强调政策的严肃性，同时提升借款人挪用资金的违规成本，引导其合法合规地申请银行贷款。对涉嫌违法违规的中介，有关部门也要严肃处理。

董希淼表示，防范资金违规流入楼市，根本上还是要加强房地产宏观调控，稳定楼市预期。市场趋于平稳，通过各种手段套取资金流入楼市的现象自然就会减少。

环球视野

美国顶级经济智囊怎么看美国经济的发展？

加拿大 贝亲网 2021年3月21日

作为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它正处于白宫经济政策的顶端。

美国近期推出高达1.9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多家机构提高了对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但市场和学者也对通胀压力加大发出警告。

迈克尔·波斯金、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杰森·福尔曼，三位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近日他们同时出现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上，对现在美国经济的发展给出各自看法。

看好美国复苏，今年增速有望突破6%

“涨潮抬起了所有的船”，斯坦福大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波斯

金引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话来说明，涨潮确实抬起了更多的船只，但也有被搁浅和留下的人，这需要政府去帮助落后的人，因此经济增长是第一要务。

波斯金表示，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在全球复苏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他自己一直看好美国的复苏，而事实也证明美国复苏确实非常强劲。美国有望在2021年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也许会达到6%以上。

他指出，人口老龄化、平衡发展与环保等问题在今后几年中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希望全球的增长能够在今后的十年回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当然不一定会非常高。企业、员工、政府、家庭都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复苏依靠刺激政策，并不担心通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经济能有乐观的复苏前景主要原因是在于其较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

“你看世界上其他国家恐怕不愿意做这种财政刺激，这种刺激规模让美国的人均财政刺激金额达到了17000美元，而新兴市场的人均金额只有17美元，这是1000倍的差距。”斯蒂格利茨如是说。

他指出，美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拜登(专题)政府跟之前有所不同，正在做正确的事情。政府可以在科技研发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有些从政府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是由私营部门帮忙落地实现。如果政府能持续在教育、研发和基础设施中投入，经济增长的前景将会更为强劲，而这些趋势会在美国也会在其他国家出现。

斯蒂格利茨直言，并不担心通胀的风险。

首先，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有很多未兑现的生产潜能。其次，即使通胀水平提高，政府也有利率和货币政策等许多工具用来应对，跟过去相比，工具箱已经明显拓展。

“我们现在可以从互联网上搜集到大量的事实数据，并不需要等待几周才能监测到通胀数据。”斯蒂格利茨表示，全球都处于零利率水平会导致市场扭曲，因此提升利率并非一件坏事。

从财政政策来看，斯蒂格利茨认为，若通胀水平抬头，还可以从财税方面着手解决。“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其税制。我们应该对企业增税，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在经济疲软时期可能不敢这么做，但当经济以6%的速度增长时，在出现通胀压力后，我们可以启用财政政策，让我们的税收结构变得更健康。”

经常性账户赤字上升，刺激政策逐渐加码

哈佛大学教授杰森·福尔曼指出，美国推出了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这意味着人们将从中国、欧洲、日本(专题)购买商品，这就会扩大经常账户赤字。“美国经济的

复苏会比欧洲复苏更强劲，这也意味着经常性账户的赤字会上升，但这其实是美国经济的一大动力。”

福尔曼认为，从中期来说，经常性账户赤字达到GDP的2%至3%，也不是一件值得担忧的事情。消费增加和人口结构的改变都会对其有所影响，但过去几十年基本都保持在2%-3%的比例，所以该比例是可持续的。

在他看来，美国可以负担得起5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刺激政策可能会不断加码，一开始比较少，后面比较大。

对于美国政府未来的计划，福尔曼表示，刺激方案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救助民众，让经济重回正轨，这已经起效，到明年美国的GDP和就业率就可以恢复正常。但财政刺激是一个临时性的举措，还需要其他措施来维持增长。第二步是需要应对一些气候变化问题，需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更好地进行政策设计，更多关注气候变化、基础设施以及人的问题，提高教育水平和降低儿童贫困率。

“十四五”规划促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

新华澳报网 2021年3月20日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元年，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港澳亦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澳门经济学会会长刘本立表示，对澳门而言，规划包括支持澳门丰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内涵，支持粤澳合作共建横琴，扩展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功能，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支持澳门发展中医药研发制造、特色金融、高新技术和会展商贸等产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都体现了中央对澳门特区的关怀，同时为澳门经济走向适度多元的路道上指明了方向，并且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支撑。

刘本立指出，为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国家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澳门正处于国家“双循环”的交汇点上，既是机遇与优势，也是责任与担当，澳门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等的独特定位及制度优势，以协同建设横琴及粤港澳大湾区为切入点，为国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出澳门应有贡献。随着中央将公布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琴澳融合发展，澳门必需与广东省协同做好建设横琴这篇文章，同时可以为澳门经济的适度多元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去年国家在疫情防控上取得重大成果，经济按年同比增长2.3%，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展望2021年，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将持续释放强大的需求

拉动力，全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设定在百分之六以上。在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之下，倘若澳门特区的新冠疫苗接种程度日渐普及，以及疫情防控成果得到巩固，澳门经济今年可望透过进一步融入国家经济大循环，加快疫后复苏的步伐。

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监事邓卓辉表示，“十四五”规划特别提到，中央支持澳门加快发展中医药、特色金融、高新科技、会展等新产业。其中，澳门的金融业已有一定基础，金融服务业占澳门整体产业结构的比例约6.8%，是澳门的第三大产业。疫情下，澳门支柱产业旅游业受到严重冲击，而金融业却能凭借相对稳固的根基，表现出较强的韧性。2020年全年澳门银行业盈利同比仍有增长，可望在疫后成为推动经济适度多元的有力抓手。相对于香港，澳门虽然不是国际金融中心，但同样具有单独关税区、资金与资讯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与资本增值税等先天优势，澳门的个人所得和企业税率甚至比香港更低，澳门更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可同时使用港元、澳门元和人民币自由结算的城市。

澳门加快发展特色金融，不仅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具有深远意义，而且也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支撑。澳门正处于国家“双循环”的交汇点上，结合珠江西岸唯一中心城市的功能，可望进一步拓展具有澳门特色金融业的发展空间。澳门应探索与邻近地区错位发展，并加快推进落实中央《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各项政策措施，更应利用好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新机遇，与粤方探讨推动“澳门—珠海跨境金融合作示范区”的建设工作，吸引具实力的金融机构落户聚集。澳门可以债券融资业务和人民币清算业务为切入点，联通大湾区和葡语国家，继续做好中葡金融平台角色，并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助力国家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澳门亦应继续夯实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和金融基建的建设，为未来债券市场创设更有利的发展环境。

中美经贸领域的三大潜在风险

张明 香港《经济导报》2021年4期

对中美经贸冲突演进趋势的判断

对中美经贸冲突未来演进趋势的判断，有两点非常重要：

第一，特朗普时代美国政府试图实现与中国的全面脱钩，而拜登时代美国更可能追求与中国的定向脱钩，也即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

第二，和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举措不同，未来拜登政府更可能通过多边主义举措来遏制中国，而中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多边主义举措来进行应对。中美博弈有些类似我

国战国时期的大国之间的“合纵”与“连横”。换言之，多边主义会是未来中美博弈的关键词。

对我国的应对措施而言，有两点也很重要：

第一，在大国博弈中很难谈“理性”。对美国精英阶层而言，在下一阶段，很难说和中国密切合作是更“理性”呢？还是对中国进行特定遏制是更“理性”呢？在国家利益面前，很可能立场不一样，“理性”这个词的定义也不一样。

第二，“胡萝卜+大棒”的策略中国政府还是要慎提。以前各国对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批评就是，外交方面动不动就是“胡萝卜+大棒”，听话就给利益，不听话就施压。未来在经济外交方面，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要讲情怀，在经济利益之外还应考虑各种其他要求，例如意识形态、公共产品、全球关怀等。在明面上要做到各种策略并重，不要过分强调经济利益，虽然各种策略背后都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中美经贸领域的三大潜在风险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个人认为，中美经贸领域存在三个潜在风险点：

第一，关于中美经常账户失衡和人民币汇率操纵的提法可能重新浮出水面。在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出口不降反升，以至于去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创下多年来新高。而在1.9万亿美元的新财政刺激投放后，今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大概率会进一步扩大。因此，不排除美国政客重新利用中美经常账户失衡做文章，例如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等，通过上述手段来要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针对这样的可能性，我国政府对此应该提前做好预判与准备。此外，美国政府还可能把贸易问题和金融问题联系起来，比如在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基础上，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尤其是对美资金融机构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我国政府对此也应做好准备与预案。

第二，中美金融领域的冲突存在进一步激化的可能性。这里我有三点思考。其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强硬地要求部分中概股从美国股票市场退市，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在拜登上台后，上述趋势并没有改变。如果未来美国政府继续对中概股实施严格的审查和刁难，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需要系统思考。其二，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对中美直接投资领域的审查继续保持严格打压态势，美国政府会继续发挥外国直接投资委员会（CFIUS）的作用，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企业并购美国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过于乐观。其三，新冠疫情后，美国政府花了巨大成本稳定市场与提振经济，例如扩张财政政策的规模前所未有的，由此产生了一种风险，即美国政府会像过去一样，通过特定方式把其庞大的政策成本让其他国家来分担，而中国投资者很可

能会分担其部分成本。

当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1.4%，而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3%，中间存在近200个基点的息差，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去年升值超过6%。如果美国投资者向中国投资者卖出10年期美国国债，并从中国投资者手里买入10年期中国国债，那么美国投资者可以获益超8%，这还没有考虑加杠杆。换言之，在当前形势下，如果鼓励中国投资者加大海外证券投资力度，他们大概率会买入大量美国国债，这些资金如果被美国金融机构反过来用来买入我国国债的话，美国人就能获得息差加上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收益。上述交易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国民财富的损失，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帮助美国政府承担了部分救市成本。

第三，拜登政府将会把经济与政治两手牌一起打。特朗普政府虽然也在打政治牌，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此外，打政治牌需要盟友配合，而特朗普政府实行的单边主义外交策略很难获得盟友的配合。而拜登政府上台后，大概率会和奥巴马政府一样，把经济牌与政治牌一起打。在奥巴马时期，中美博弈带给中国的主要压力不是来自经济领域，而是来自地缘政治和多边领域，这一情况可能会重演。因此，美国政府可能会拿中国的一些敏感地区的“人权”问题大做文章，也可能在中国周边一些地缘热点区域兴风作浪。美国政府会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互融合，团结盟友一起向中国施压。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呢？美国政府通过多边主义施压，我国政府也一定要以多边主义来应对。在这个方面应该有一套系统策略，应该用透明度更高的、市场化更强的、国际社会更能理解的一系列策略和方式进行应对，对此要做好充分准备。

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

中国的应对策略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要努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套以我为主、兼顾内外的系统发展策略。

关于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有三点非常重要：一是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这背后最重要的是持续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二是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自主创新；三是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这三大支柱如果得到妥善解决，就能顺利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关于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从贸易层面来看，新冠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区域化与周边化。基于上述趋势，中国政府应该努力在RCEP和“一带一路”区域内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产业链。从金融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应该通过新的策略来推进人民币一体化，例如拓展人民币作为计价

货币的功能、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着力在RCEP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对于人民币的黏性和真实需求等。从开放层面来看，下一步要把目前中国20个左右的省级自贸区、自贸港做实做细，要让这些自贸区、自贸港的开放各具特色，不要千篇一律，可以在不同的自贸区进行不同的政策试验。

第二，中国政府要继续高举多边主义的大旗。首先，如果认为中美博弈将是一个长期趋势，那么未来怎样发展和欧盟、英国、日韩、澳新等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将是重中之重，如何与各国发展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其次，不要忘记我国依然是新兴市场国家，中国政府依然应该充当新兴市场国家的旗手和代言人。

第三，我国要积极主动地和美国沟通、交流与互动。双边博弈是一回事，互利发展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领域有三点很重要：一是要着力在美国发展对华友好的力量。这些力量曾经是美国的大企业、大金融机构与科研学术界，但在特朗普上台后被明显削弱了。因此，要努力发展能够理解中国的、对华友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可以穿越美国大选的政治周期的，未来无论是谁上任，都可以持续发挥作用的；二是一方面要明确与美国博弈的底线，但另一方面手里也要有一些砝码。底线是寸步不让的，但特定砝码在某些时候是可以和美国进行讨价还价的；三是要形成一个与美国博弈的整体策略。前段时间在一个会议上，我听到的一位国际关系学者的话让人印象深刻：美国对华是大战略，而我国迄今为止应对美国的策略基本上见招拆招，是被动防守。我国亟需形成一套和美国长期博弈的大战略。用大战略应对大战略，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时事观察

专家谈新兴市场加息狂潮

随着全球疫苗接种加速、全球通胀及其预期持续抬升，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国纷纷加息，市场对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加息预期也在上升。新一轮的新兴市场加息狂潮似乎正在袭来，这会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哪些影响？中国将如何应对？本栏目搜集和整理了多位专家学者的言论，以供参考。

加息料将给新兴市场带来苦难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 **Carmen Reinhart**、彭博经济首席新兴市场经济学家 **Ziad Daoud**、彭博经济首席新兴市场经济学家 **Ziad Daoud**：利率政策的转变对于那些仍处在艰难复苏，或债务负担在疫情期间通胀的经济体而言最为痛苦。而包括食品价格在内的消费价格上涨将导致更高的利率，这可能对世界上最贫

穷的国家造成最大的伤害。粮食价格和通货膨胀的题材在不平等问题上影响很大，这种冲击会产生非常不平等的影响。土耳其和尼日利亚就有这种风险。新兴市场采取一连串加息，试图抵御货币贬值，并限制通货膨胀的上涨。与疫情有关的借贷激增已加剧了风险。去年，随着全球各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筹集了 24 万亿美元，以抵消疫情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未偿还债务总额升到了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的 250%。增幅最大的国家包括土耳其、韩国和阿联酋。而且，短期内这些借贷规模减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此前已警告各国政府，不要过早取消刺激措施。对于新兴市场的央行来说，形势正在发生转变。它的时机很不幸——多数新兴市场尚未完全从疫情的衰退中复苏。（新浪网 2021 年 3 月 15 日）

哪些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麻烦最大？ 野村证券驻新加坡的全球市场研究主管 **Rob**

Subbaraman: 与 2013 年的“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时期相比，眼下一些新兴国家可能仍处于更好的境地，能够经受住这场风暴。其中，亚洲的新兴市场央行已经建立了关键的缓冲，它们的外汇储备去年增长了 4680 亿美元，这一数字是 8 年来最多的。各国政府可能会追随美国财长耶伦的号召，在今年的财政政策上采取重大行动，继续保持巨额甚至更大的财政赤字。然而，这将是一个危险的战略。新兴市场政府的净利息负担是发达市场政府的三倍以上，而新兴市场既更容易发生通货膨胀，也更依赖外部融资。2011 年至 2020 年，南非、埃及、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政府债务净利息支付占产出的比例均已大幅上升。（环球网 2021 年 3 月 17 日）

全球加息周期已启动 美华创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张瑜**：当前土耳其、巴西、俄罗斯均面临通胀压力，同时还存在汇率贬值的现象。目前存在加息预期的经济体包括印度、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在此背景下，全球加息周期已启动！研究了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验，发现：非美经济体的加息周期启动时点距离本国降息时点间隔约 1-2 年；加息原因主要是经济修复、通胀高企，此外，由于危机后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美债收益率显著上行，致使新兴市场资本存在外流压力，加息可对冲这一影响。再看当下，经济修复、通胀预期升温、美债利率上行……一些似曾相识的情形陆续出现。危机发生初期，通常先在发达经济体爆发，带来美英日欧等全球主要需求国率先降息；随着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蔓延至全球，制造国（韩国、东盟国家等）与资源国（巴西、俄罗斯等）开始降息。经济修复期间，资源国通常率先出现通胀压力，进入加息周期；随后全球需求改善带来

制造国经济回暖，进入加息周期；而发达经济体作为最终需求国，通常最后进入加息周期。目前来看，全球已进入到资源国为主的加息周期，巴西、俄罗斯均已启动加息；后续或将启动制造国的加息周期，市场预期韩国、泰国、印度等将于1-2年内加息；美欧等最终需求国的加息时点或还很远。（中国证券报网 2021年3月22日）

中国年内无加息压力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和货币贬值问题长期不同程度的存在，利率水平及其上涨幅度普遍高于发达国家，相当多的国家也都高于中国，总体来看此次加息可能也对全球和中国的扩散影响有限。在双循环、以我为主、政策工具储备充足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没有必要采取跟随策略，而是需要针对中国物价变动、就业情况和潜在增长目标来进行跨周期调节，同时采取结构性政策，灵活精准地调节经济运行。如果央行将此解读为工业部门的局部过热，虽然几乎不可能提升政策利率，但不排除加大对信贷政策的调整，引导银行减缓信贷投放节奏。由于消费需求对货币政策并不敏感，央行也不会投鼠忌器，换句话说，央行不会担心消费会因为政策收紧而明显减少。（香港大公网 2021年3月29日）

聚焦2021年全国两会

政府工作报告的三个鲜明特点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三个鲜明特点。第一，更加注重战略筹划。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仅着眼于今年一年的发展，更是为未来“十四五”的五年，乃至未来15年，到2035年远景目标都做了整体的筹划和布局。不仅要着眼于今天，还着眼于未来。第二，精准部署。很好的战略目标提出来了，如何具体落实，就一定要精准、有效、有针对性，通过一系列具体举措，把我们宏大的战略目标落实好。第三，体现稳健务实的态度。去年以来，国内国际的经济发展形势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要求我们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丧失信心，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并建立在稳健的基础上，保持连贯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政策。“稳”不是保守，而是在清醒理智基础上的奋发有为，稳中有进。（新华网 2021年3月6日）

国企改革市场化方向将取得明显进展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今年国企改革要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70%，任务可谓紧迫，这意味着今年的国企改革可能不会面面俱到，而是找到几个关键切入口来逐步推进。现在看来，关键就在公司化

治理、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结构调整，这些都是朝着市场化运行机制的方向改变。如果今年任务要完成，那么国企改革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应该会取得明显的进展，尤其是激励方式方面。当前整个中国，科技创新都是最突出的任务之一，国企自然也是担负着科技创新的重任，这本身也是结构调整的要义。而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就是科研人员积极性的调动，可能会采用揭榜挂帅的方法，增强科研人员的自主权，并增加科研人员的个人利益。目前，国家大规模提升了核心技术领域攻关的投入，相信必然会对科研人员的待遇进行改善，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今年是国企改革最重要的一年，科技创新、结构调整、混合所有制改革，最关键的还是人。人的积极性提高了，国企改革的推动也会减少很多阻力。（香港商报网 2021年3月11日）

扩内需成战略基点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此前中国将内需视为平行的“三驾马车”之一，而“十四五”时期将内需上升为“战略基点”，这显然将内需放到了更为重要的地位，意味着内需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这更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潜力。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更有正在不断释放潜力的体量更为庞大的下沉市场消费；中国不但有生产消费，更有正在不断释放潜力的生活消费。应当说，中国的市场还有很大潜力没有挖掘出来。首先是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供给稀缺，比如医药、教育、养老、旅游、金融等很多行业高端供给严重不足，服务水平较差。同时，低端、无效供给挤占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其次，国内大循环还存在着一些体制机制上的堵点，比如各地对于汽车消费设置了很多限购、限行等措施，抑制了汽车消费，而这又抑制了出行、旅游、餐饮等一系列其他消费，消费是相互触发的。需要加快改革，打破这些体制性束缚。此外，中国还需要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地区分割，降低内部流通成本。比如，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在14.6%左右，明显高于一般西方国家8%左右的水平，而全国统一大市场仍面临着一些地方的保护主义壁垒。再次，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保体系，让民众能够消费、敢于消费。因此远景目标明确提出，要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21世纪经济报道》2021年3月14日）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我国养老金制度出现收不抵支是必然趋势，预计2029年中国养老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2036年累计结余将耗尽，此后每年出现缺口。“十四五”期间应制定顶层设计，从“负债型”养老金向“资

产型”养老金过渡，从当前的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积累制，以资本红利递补人口红利的消失。同时，尽快引入多缴多的激励机制，并考虑扩大国资划转规模。延迟退休主要涉及三个年龄群体，即原定退休年龄的60岁男性，55岁女干部以及50岁女工人。一定要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目前，绝大部分学术同行倾向于一年延迟三个月或四个月，这样既起到渐进的作用，又不会像一年延迟两个月、六年才能延迟一岁那样时间过长，也比较适合我国国情。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要以更大力度把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提高划转比例，养老金支付压力较大的地区划转比例可以再高一些，并与适当延迟退休年龄、提高统筹层次等改革同步推进。（《21世纪经济报道》2021年3月14日）

GDP增速目标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中国气候与能源政策主任**林明彻**：GDP增速目标的制定还要量力而行。2021年GDP增速目标，不能定得太低，太容易实现的目标起不到导向与激励作用；也不能定得太高，以免超出实际能力。将GDP增速目标设定为“6%以上”，充分体现了“底线思维”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表明要利用好当前经济较快增长的窗口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重视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以往五年规划不同的是，规划纲要草案没有设定5年的年均增速指标，而是提出“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这对地方政府发出了明确信号：GDP不再是唯一或最重要的考核标准。”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出，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这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提出明确要求，环境和经济增长同样重要，都需要更平衡的发展。（新华财经 2021年3月6日）

信息快递

去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7,131 元 香港文汇报 3 月 13 日报道，记者 12 日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2020 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7,131 元（人民币，下同），增速连续 11 年跑赢城镇居民。农业农村部当天对外公布“十三五”期间（2016 年至 2020 年）中国农民收入情况。情况显示，近五年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2019 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6,021 元，提前 1

年实现比 2010 年翻一番目标。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着力稳就业、促创业、兴产业，农民收入逐季好转，全年实际增长 3.8%，收入达到 17,131 元，较 2015 年增加 5,709 元。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较快，2020 年达到 12,588 元，“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 7.87%，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1.87 个百分点。从收入结构看，除了务农增收，外出打工、在乡创业、盘活资源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务工收入方面，农民工数量稳步增加，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工资性收入 2020 年达到 6,974 元，5 年间增加 2,374 元，对农民增收贡献最大，贡献率达 41.6%。

上海探索将国资总额市值管理纳入考核 香港 紫荆网 3 月 9 日报道，近日召开的上海市国资国企改革暨党建工作会议提出，2021 年上海将持续优化国资布局，深化国企综合改革，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服务国家战略，大力实施科技创新；管好国有资本，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发展。根据会议披露的信息，2021 年上海将开展上市国企高质量专项行动，探索将市值管理纳入企业考核评优体系。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随着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上市国企在 A 股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上海市国资委提出，将开展上市公司高质量专项行动，实施一批资产重组、市场融资和股权转让等项目。建立市值管理绩效水平分析评价机制，探索将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纳入国企考核评优体系。与此同时，上海还将引导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作为重要积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积极探索企业员工以科技成果出资入股，在金融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针对国有相对控股混改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在监管内容、方式和程序上与国有独资或全资子公司有所不同。

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6%底气何来 香港《经济导报》3月29日报道，今年全国两会上，2021年中国政府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6%以上。2021年中国经济已经有越来越多地利好中国经济发展：首先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的最困难时刻已经过去；其次2020年终欧经济两个循环发展格局取得巨大成功，为2021年中国经济买上新台阶奠定了雄厚基础。第三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在引领中国经济全面转型、升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第四全球疫情形势正在好转，目前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展开接种疫苗工作，疫情拐点正在渐行渐远，这也将给饱受疫情打击的全球经济带来福音，2021年全球经济有望谷底回升。

延迟退休采取渐进式改革 英国“路透中文网”3月30日报道，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表示，延迟退休弹性实施，不会搞一刀切，不是规定每个人必须达到延迟后的法定退休年龄才能退休，二是要增加个人自主选择提前退休的空间。如果延迟退休政策适时适度推进，开发利用好规模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力资源，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参与率，改善资本和劳动力配置状况。实施延迟退休改革将区分不同群体，采取适当的节奏，稳步推进，逐步到位。

本期所登言论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仅供高层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

责任编辑：吴健涛

本期编辑：何楚龙

校对：韩南

地址：文化中心D座孝感市图书馆

电话：2107189

编辑日期：2021年5月10日